

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

三国志卷

张大可 王继光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中国通史

三国志卷

陈寿著 王树德、王德林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K204.1
32

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合编
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

三 国 志 卷

主编 ~~张其成~~ ~~王继光~~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

三国志卷

丛书主编 张大可 王继光

本书编委 谢玉杰 徐景重 徐兴海

宋怀仁 谭良啸 赵生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激光照排所排版

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0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44-00380-8/K·72

定价：4.40元

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序

一 宗 旨

二十四史是中国历代汇聚起来的一套大型历史书。共三千一百四十九卷。四千五百多万字，是罕见的文化珍宝。但由于量大，又是文言文，一般人难以获得，得到了也难以通读，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本科大学生也很少问津。为了使广大的大专院校文史两系师生、广大中学文史教员、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爱好文史知识的干部等各知识阶层的人士，对二十四史这一套典籍有一个概略的了解，编选“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是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源泉。普及历史名著无疑地具有深远的意义。

这套丛书不以单部史籍为中心编选，而以时代为中心为经，以史籍为纬，两个因素交织构成选目，计划为十卷书。每一卷突出一个反映时代特点的中心思想，也兼及史籍特点。十卷书目设想如次：一《史记卷》，二《两汉书卷》，三《三国志卷》，四《晋书卷》，五《南北史卷》，六《隋书卷》，七《两唐书卷》，八《两五代史卷》，九《宋辽金元史卷》，十《明史卷》。从书目的构想就可看出，这套丛书不同于目前任何史学丛书选注本。本丛书每卷力争体现一个主题探索。《史记卷》围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书主旨选文；

《两汉书卷》和《两唐书卷》突出大一统新气象；《三国志卷》突出三国鼎立的历史原因；《晋书卷》、《南北史卷》、《宋辽金元史卷》着重民族斗争与融合；《隋书卷》探索短命王朝的历史原因；《两五代史卷》反映战乱时代的社会动态；《明史卷》侧重于明代党争选文。每卷书三十万字左右，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选目有所侧重，突现主题，表现各时代各史特色。全套丛书共十卷约三百万字，一个大学生或读史爱好者在一两年内即可浏览一过，使读者在有限的篇幅中，对二十四史的规模组织有一个概略的认识，对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宏观的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套丛书将是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新体例的丛书。大凡天下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学术著作出版难，这就是难上加难。我们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出版界的支持。

二 体 例

体例包括选目原则和注讲两个方面。各卷选目按本丛书宗旨所定主题选文，一般每卷二十篇左右。全书选文之前有一篇概述中心思想的序论。注讲内容由“题解”、“段意”、“简注”、“讲析”四个部分组成。各部分都要求反映新见解，吸收学术界科研新成果，行文则要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一）题解。题解包括四个基本项：（1）释篇题；（2）介绍传主；（3）提示篇旨；（4）述作者意向。传主写入题解，在“简注”中就不立条目。本书原文均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

（二）段意。段意是对结构段内容的高度概括，具有点题、

剖析、归纳的作用。段意用简练的语言概括，而不是选文的分段复述。

(三) 简注。简字内容为难字注音，解词，串译词句，释人名、地名、职官、掌故等。简注要求通俗，扣紧行文，一般不作引证，歧说只注一说。地名注释，凡行政区只注治所在今的准确方位，一律不注辖区范围和沿革。各篇选文独立为注，重出条目不注参见，以便读者。

(四) 讲析。讲析内容扣紧传文，分析评价其思想内容，历史内容，艺术内容，以及传文的史料价值。“讲析”要求具有较高的学术性，要求有新见解，力避写成读书札记或考证文章。“讲析”不进行百家争鸣，而只是紧扣传文具体分析。

三 组 织

编选“二十四史选注讲丛书”的设想，最初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兰州大学历史系张大可教授在1986年于山西夏县召开的年会上正式提出，得到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支持；嗣后西北民院历史系王继光副教授襄赞其事，并由西北民院上报国家民委，又得到国家民委学术委员会的支持。丛书主编由张大可与王继光两人承担，组织总体工作。丛书编委，每卷分别聘定。编选作者基本队伍是各高校及科研单位的中国文献研究会会员。参加本书《三国志卷》的作者有二十二位，分散在全国十八个单位。按各单位总笔划为序：兰州大学张大可、汪受宽、翟婉华；武汉大学张孝美；宁夏大学王天顺；陕西师大徐兴海；西北民院王继光、谢玉杰；南京师大赵生群；四平师院张瑞昌；上海师院奚柳芳；福建师大吴钰钰、陈培坤；杭

州师院邹身城；南充师院柯昌基；西南师院邓堪；重庆师院徐景重；昆明党校范传贤；哈尔滨师大宋怀仁；甘肃天水师专徐日辉；甘肃平凉师范胡幼琼；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谭良嘯。本书编委谢玉杰、徐景重、徐兴海、宋怀仁、谭良嘯、赵生群。兰州大学和西北民院两校科研处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陕西人民出版社提供出版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中有个别古字在微机处理中不甚清晰，请读者见谅。

张大可 王继光

一九八八年元月于兰州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一 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关于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① 这种说法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目前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已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形成原因的看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藩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的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游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的发展长河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都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却是唯一的

^①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2册第5页。

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象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理论去解释。

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最长的也没有超出三百年,而短命的王朝如秦朝、隋朝等则只有几十年。每一个封建王朝解体后,都要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然后走向统一。这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①的周期性运动,也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运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②。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这是历史的趋向。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顺应历史的趋向,就能够削平战乱,统一中国。秦、西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由战乱很快走向统一,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常规的具体体现。南北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对峙都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能用“经济均衡论”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方,依恃长江天堑而偏安

①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观点,而应当看作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朝代兴亡分合的总概括。由于其发展的方向是走向统一与巩固,故引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87页。

江南。由于这样的历史状况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现。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南北对峙时，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方，因此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岳飞抗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只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败而使北伐最后归于失败。显然“经济均衡论”对这种状况是无法解释的。东汉末年不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主中原，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经济力量在任何时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使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确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国的朱治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堠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① 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②，也反映了北方供应不继的情况。

但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而孙权内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如果曹操计划周密，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形成，才出现了南北的经济均衡。这种均衡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逐步恢复，而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的人力、物力渐渐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① 《三国志·朱治传》裴注《江表传》。下引《三国志》只注篇名。

② 《周瑜传》。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地主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提条件”^①。这是没有疑义的。东汉末年战乱,豪强地主各拥兵自重,或举族而迁,或择主而居,或占山为王。颍川荀彧北依袁绍,后投曹操;临淮鲁肃南渡,往依孙权,都是举族而迁。右北平无终人田畴则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典型豪强。北方乱起,他“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制订了约束部众的二十余条法纪,“法重者至死”。此外他还制订了婚嫁之礼和学校授业之法。田畴遣使与乌丸、鲜卑交通,使之致贡,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②。当时,全国各地林立着无数个象田畴这样的强宗豪右,他们就是东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基础。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如果得不到这些地方豪强的支持,就很难立足。据有北方幽、冀、青、并四州的大军阀袁绍,招命田畴,礼命五至,畴终不出。曹孙刘三家都是得到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公元一九四年陶谦让徐州给刘备,刘备不敢受。后得下邳陈登支持,刘备才领徐州牧。但终因基础薄弱,刘备两次得徐州,两次失徐州,在北方不能立足。后来他在荆州驻屯十余年,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蜀,又得益州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建立了蜀汉。孙权得到江北大族张昭、周瑜的支持,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以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才在江东站稳脚跟。曹操是以颍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干,并得到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袁曹角逐,曹胜袁败,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

① 朱绍侯:《略论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7期。

② 《田畴传》。

因素，就是很多田畴这样的豪强的弃袁投曹。

但是，地主豪强集团的割据性只能说明它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并不能说明必然形成三分。因为“军阀混战”与“形成三分”之间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二者不能划等号。东汉末年的所有军阀都得到了其割据地地主豪强集团的支持。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就没有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提条件”。所谓“前提条件”，就是“先决条件”，或者叫“可能条件”，它只是提供“形成三分”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因为军阀混战可以兼并为三；也可以兼并为二；也可以兼并为—，即直接走向统一。东汉末年战乱走向三分，是中国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中出现的一个历史特例，必须深入研究。

三国鼎立是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从公元一九〇年关东兵起到公元二八〇年西晋灭吴，前后九十一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一九〇年至二〇七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这一阶段，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二〇八年赤壁之战至公元二二九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这一阶段，三方斗争交错，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二三〇年至公元二八〇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三分的形成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三分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

面。三分之势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出这种寓于必然之中的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引导,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都是“偶然”的事变,在这些历史事变中,“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人谋”的历史作用,以供讨论。

二 东汉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

汉末军阀混战,使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中,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忘义的陶谦,倏彼倏此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和昏暗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略疏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和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驭才有术。由于袁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是两次决定性的战役。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设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历史的天平，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偶然性。但胜利之后，形势逆转，他们成为不可战胜的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这“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袁绍官渡之败。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袁绍不仅有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可恃，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颇具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首倡讨伐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归心，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麴义、颜良、文丑、高览、张郃等勇士为之统军。但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对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

① 《吴主传》裴注《江表传》。

拱手让曹，就输了一着。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处处主动。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藉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曹操与袁绍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是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与曹操相比，袁绍只是一个“小器”。王夫之说：“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① 袁绍能屈韩馥、公孙瓒之辈，而不能屈曹操，故不能建非常之业。曹操高于袁绍，不仅仅是个人的政治素质，最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袁绍看重的是地利和兵力，曹操看重的是人才和道义。所以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②

曹操赤壁之败。曹操用兵如神，善能以少胜众，以弱克强，但在赤壁之战中却是御众而败，盛强而摧，大大出人意料。王夫之的分析说：“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

① 《读通鉴论》卷九。下引王夫之语均出此篇，不再注。

② 《诸葛亮传》。下引诸葛亮语出此篇者不再注。

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就是说,曹操也没有真正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之士,而只是为一己之私利用权术驾驭人才。谋士的意见,投合自己的私心就采纳,不投合自己的私心就不采纳。曹操赤壁之败的原因正在于此。他不听贾诩、程昱的善计而急于东进,重蹈袁绍拒谏的覆辙,走上了恃众欺寡,恃强凌弱的失败之路。曹操之急于东进,正如袁绍之急于南下一样,是急于做皇帝,以建非常之功。结果欲速而不达,被孙刘联军所击败。赤壁之战是一场斗智斗力的群英会。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齐心合力共御曹操,而曹操却颐指气使,以一人刚愎自用之智,抗天下群英之智,败亡是必然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前者袁绍失败,后者曹操失败,使统一的局势一再受挫,从而演成了三分之局。这两次弱者挫败强敌的战役,都是“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壁之战,刘孙联合的基础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势为前提的。尽管刘备败逃,无存身之地,但“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①,所以孙权对诸葛亮说:“非刘豫州莫可以抗曹操者”^②。诸葛亮出使江东就是以鼎足三分为条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他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东汉末的人才三分,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绍,后归曹

① 《程昱传》所载曹操谋士程昱语。

② 孙权语见《诸葛亮传》。